

序

吴宗锡

陈云同志和评弹界的交往始于 1958 年。当时，他因心脏病休养，医生认为他用脑过度，他就选择了童年在家乡听过的评弹，作为休养时松弛神经的文娱活动。他曾告诉我，听了评弹，脑子里其他思想就都放开了。但他没有停留于聆听和欣赏评弹，根据他长期的工作习惯，自 1958 年下半年起，他结合听书找从事评弹工作的干部了解情况。1959 年后，就系统地对评弹艺术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等展开调查研究。从 1959 年陈云同志接见上海人民评弹团干部时的戏言“我是名誉团长”中，可以领悟到，陈云同志那时已经有心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给评弹工作以指导、启迪和扶掖了。陈云同志的工作作风一贯细致深入，重调查，讲民主，思想方法科学辩证，实事求是。这些也都体现于他对评弹工作的关注中。

几十年来，他在和评弹界的交往中，既接触干部也接触编演人员，偶尔还在书场茶馆中接触一些老听客。他接触各层次的干部，也接触各种年龄层次和业务水平的演员，但接触较多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和青年演员。在干部中更多地找的是我们几个长期从事评弹工作的同志。江浙沪三地，每地一人。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体制，他通过我们安排聆听书目，收集资

料，联系评弹界人士。有什么重要意见，大多也通过我们传达贯彻。在我们来说，当然尊陈云同志为敬爱的领导，而陈云同志对我们却以朋友相待，和蔼亲切，关爱有加，使我们感到了如春风夏雨的温煦润泽。

他和演员交谈，涉及的面很广。诸凡有关评弹的历史、现状，包括书目的整理继承创新，艺术的革新发展，评弹团体及书场的经营收益，青年人才的培养教育和演员的甘苦忧乐等，无不殷殷垂询，所有各端，尽在他的关怀之中。对各种见解、想法，他都悉心倾听，给予指导。

研究评弹，当然首先要听评弹。陈云同志曾多次深入书场，坐在广大听众中欣赏评弹艺术，也出席内部组织的晚会，但更多的是利用录音设备，聆听电台为他录制的评弹录音。数十年来，除“文革”期间曾经中断外，陈云同志几乎无一日不听评弹。他听过几乎所有的传统书目和大量新编历史书和现代题材书目，有的听过不同演员不同风格对同一书目的演出，还有的对同一演员演唱的同一书目听过两遍以上。他听过的书目和演出远远超过了专门从事评弹工作的干部，也超过了那些毕生从事评弹的老艺人。

为了研究，陈云同志有时对一个书目反复聆听，像中篇评弹《真情假意》，曾听了数十遍。有时，陈云同志还对一些书目细心地统计其中唱篇和说表、乃至噱头和正书的比重，有时还将唱篇的词句默记下来。显然这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欣赏了。

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，再经过深思熟虑，陈云同志就会发表他的精辟的指导性意见。这些意见是建议性的，又是协商性的。他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。即使在与干部谈话时，他也常常征询别人的看法，从不轻易下结论。他还教

育我们：“人的认识是发展的，会变化的。我们不要怕改变自己的认识。”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深入实际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，他常能不受“左”或右的干扰，给评弹工作以高屋建瓴的指引。他还帮助编演人员总结经验，给他们以及时的鼓励和支持。

陈云同志作为一个欣赏者，自然也有他的好恶。他比较喜爱那些情真理深、典雅而又诙谐风趣的节目。但是他在和编演人员的谈话中，从不轻易流露个人的好恶，也从不以此左右他对评弹工作的指导性意见。

1959年到1983年的数十年间，陈云同志在和干部、编演人员的交往中，发表了有关评弹的艺术特点、整旧创新、人才培养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许多精辟的见解，其中一部分选编为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一书。后来，又补充了1984年至1990年的一些材料，续出了“增订本”。这不但对评弹，而且对其他文艺品类来说，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还需要补充一点。陈云同志在进书场听评弹时，往往自买书票。有些他需要保存的录音带，也由个人付费。1964年为研学弹词琵琶的弹奏，请周云瑞至苏州、朱介生到北京做客，也是由陈云同志个人提供旅费的。

这样，我们整理出版陈云同志和苏州评弹界的交往实录，便记录下了这段珍贵的史实，从而也反映出陈云同志深入群众，深入实际以及俭朴、严正、诚谨、缜密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高尚品德。

在我们的党政领导人中，不乏对文艺热爱关心者。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再有第二人，能像陈云同志那样利用业余时间，对一门艺术做如此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；也似乎没有第二个人

像陈云同志那样，对一门艺术透彻掌握其规律特性，对其人员、作品与艺术那样熟谙与精通。其精通程度已经超过了所有从事这门艺术的专门家，即使那些资深的老艺术家也无不衷心折服。

所有这些，实在是出于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热爱祖国、社会、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和伟大胸怀。因此，他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，热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，并且热忱企望着这门艺术在新的时代里能为人民服务得更好。

感纫于陈云同志这样的襟怀和心意，我们能不珍视这份交往实录吗？

1999 年 12 月 14 日

引 子

陈云从小喜欢听评弹。他自己多次说过：“我十岁前就听书，在我们家乡，先是跟我舅舅去听，听上瘾了，有时候大人不去，就一个人自己去听，到现在六十几年了。中间一段，要干革命，很多年没有听。一九五七年、一九五九年先后两次到南方养病，听听评弹，觉得对养病有好处。本来头脑发胀，听听书就好些，这样又重新听了。”^①“我是听‘戩壁书’出身，听《英烈》（阴立的）小时在家乡章练塘。”

据朱习理、王志涛撰写的《陈云同志幼年在练塘》载：“陈云从小酷爱听评弹。练塘地区属吴语区，弹词、评话素为人民喜爱，拥有大量听众。练塘最早的畅园书场建于清朝末年，就在混堂浜，离陈云舅父家仅三十米左右。民国初年在畅园边上，又造了一个书场，名‘长春园’。这书场有二百多座位，为了招揽听众，每天上午派个伙计，搨着一块写有当天书目及艺人姓名的木牌，敲着小锣在全镇上塘街、下塘街兜一圈，一些孩子兴致勃勃地跟着伙计走，有时，陈云也兴高采烈地跟在这群孩子里。书场一般每天日夜二场，听书的人进去后，选择最佳位置坐好，跑堂来泡上一壶茶，并向听众收取茶资，书场与艺人以四六或对半折账来分配茶资收入。书场的小台仅一尺高，台上一只书桌，两把椅子，面对书场大门。大门

① 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 87～88 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 79 页。

里两旁墙壁前有一排钩子，专为农民听书时挂篮子用。陈云小时候，有空就站在书场后面，靠在墙壁上听书，人称‘靠壁书’。”

李蕊珍、姚元祥撰写的《陈云早期革命活动述略》一文中也有记载：练塘“镇上有个畅园书场，离他舅父家很近，陈云常常在做完功课后去书场听书”。^②陈云还把从书场听到的故事，像说书先生一样有声有色地讲给同学们听，什么杀赃官、救百姓，景阳冈武松打虎，岳飞精忠报国等，使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。由此既锻炼了陈云流利的口才，又唤起少年陈云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。

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尤其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间，陈云听书的次数很多，但没有详细记载，只能根据一部分同志的回忆，了解约略的情况。如据蒋月泉^③回忆，一九五四年他和朱慧珍^④在苏州南林饭店曾为陈云演出过。据颜仁翰^⑤回忆，他第一次见到陈云是一九五八年夏天，陈云在苏州听书，演出结束后，找他谈过话。陈云在交谈中说，他小时候听过书，后来参加了革命，南征北战，没有时间听书了。解放后，到南方来，又开始听书。他认为评弹形式简单，但可以深入群众，作用很大。

《陈云和他的事业》（上）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163
164 页。

《陈云和他的事业》（下）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977
页。

蒋月泉（1917— ）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朱慧珍（1921—1969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颜仁翰（1927—1996），时任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。

一九五九年，陈云还在无锡听过徐云志、王鹰^①的《三笑》。

这段时间内，陈云还听过汪梅韵、高雪芳^②的演出。在上海听过赵开生、朱雪玲^③的《珍珠塔》和蒋云仙^④的《野火春风斗古城·母子会》和《啼笑因缘·逼疯》。

为陈云演出过的还有潘伯英、周玉泉、薛君亚、曹啸君、庞学庭、谢汉庭、刘小琴^⑤等。

一次，陈云在苏州听书，演出结束后，曾找当时在苏州市文化局戏曲科工作的张韵平^⑥谈话，了解青年演员的培养工作和当时颇有争议的“侯调”，肯定了侯莉君^⑦的创新精神。

一九五九年以后，陈云和苏州评弹界的交往，才有了比较多的资料和比较详细的记述。

① 徐云志（1901—1978）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王鹰（1937— ），女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，后曾任苏州评弹学校副校长。

② 汪梅韵（1922— ）、高雪芳（1927— ），当时都是江苏省评弹团女演员。

③ 赵开生（1936— ）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朱雪玲（1932— 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长征评弹团演员。

④ 蒋云仙（1933— 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长征评弹团演员。

⑤ 潘伯英（1903—1968），评话演员、评弹作家，曾任苏州市文联副主席。周玉泉（1897—1974）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薛君亚（1932— ），女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曹啸君（1916— ），时为江苏省评弹团演员。庞学庭（1918—1991）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谢汉庭（1918— ）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刘小琴（1931— ），女，时为苏州市评弹团演员。

⑥ 张韵平（1928— ），女，时任苏州市文化局戏曲科副科长，后曾任江苏省评弹团副团长。

⑦ 侯莉君（1925— ），女，时为江苏省评弹团演员。

一九五九年

秋 在杭州听陆耀良^①说《林海雪原》。

十一月十三日 在杭州和李碧岩^②、施振眉^③谈话。谈话的内容，主要是评弹新书目的创作和评弹的推广等问题。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，陈云发表了许多意见。他说，在曲艺中，像评弹那样有很强感染力的，是少有的。评弹大可发展，应该努力扩大业余队伍，让群众掌握评弹，评弹的群众基础就更好了。评弹要反映群众的生活，这样评弹的节目就多了。评弹要创作新节目，但只靠专业搞创作的人是不够的，他们的人数太少了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在杭州和李太成、吴宗锡、李庆福、何占春^④等座谈评弹工作。陈云在谈话中把评弹的书目分成三类：一类书，即传统书，也称老书。“这是长期流传，经过历代艺人加工，逐步提高的。在这类书目里，精华和糟粕并存，有的毒素较多，有的少些。另一方面，评弹的传统

陆耀良（1918— ），时为上海长征评弹团评话演员。

② 李碧岩，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。

施振眉（1932— ），当时在浙江省文化局戏剧处工作，后曾任浙江省曲协主席，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。

李太成，当时为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。吴宗锡（1925— ），当时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团长，后曾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、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。李庆福，当时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副团长，后曾任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。何占春（1922— ），当时在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工作。

说表艺术^①比较丰富。”二类书，这是解放初期部分艺人发起“斩尾巴”^②以后产生的。“这类书目，大抵是根据古典小说和当时流行的传统戏曲改编的，一般讲，反动、迷信、黄色的毒素较少。但是，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也运用得较少。”三类书，指现代题材的新书。“这是解放后新编的。这类书目，思想性一般比较强，但艺术上比较粗糙。”

对这三类书，陈云分别提出了要求。他说，对传统书，要逐步进行整理。传统书“如果不整理，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一代接受。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，很可惜”。整理传统书态度要积极，但必须慎重，因为这是一个牵涉到许多人吃饭的问题。“对现代题材的新书，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。”在这次谈话中，陈云还提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那句名言：“对老书，有七分好才鼓掌；对新书，有三分好就要鼓掌。”他还提出，要重视创新工作，专业作家不够，可以用带徒弟的方式培养。此外，也要发动评弹艺人深入生活，创作新节目。要扩大新书演出阵地，有些反映工农题材的短篇节目，可以送到工厂、农村去，是会受到欢迎的。

陈云在谈话中还提出应该重视对评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，“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。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。要从全局出发，防止本位主义。”

① 说表艺术，指评弹中运用说白和表叙的艺术。

② “斩尾巴”，是解放初期部分评弹艺人发起的停说传统书目的运动。

③ 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 1 页。

④ 同上书，第 2 页。

⑤ 同上书，第 5 页。

当时陈云经常去书场听书。他在谈话中说，每档书到杭州演出，总要到书场去听一次或听几次，其他听录音。还讲到 he 不久前听的《白蛇传》，认为那档书噱头太多。他说，噱头是要的，否则干巴巴，做报告也要轻松一些。但像“现原形”那样，说到白蛇的蛇鳞，就不美了。

十二月二日晚，在杭州听书。

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杭州举行。其间安排有几次晚会。十二月二日晚会的节目中，有王柏荫^①、高美玲^②的演出。陈云出席晚会，并观看了演出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杭州和朱慧珍、苏似荫^③谈话，向他们了解《玉蜻蜓》和《白蛇传》这两部书演出和整理的情况。陈云问得很细，知道他们在说“沈家书”，就问：原书中沈君卿的金钗是神送到苏州去的，现在怎么处理？不说金大娘娘，“抢救三娘”怎么处理？

在谈话中，陈云很关心创作力量。他说，要大力培养创作人才，不要看得太近。十年、二十年才能出人才。

当时，朱慧珍、苏似荫搭档在大华书场演出。接着他们演出的是徐丽仙^④和张维桢^⑤。

- ① 王柏荫（1923— ），时为浙江省曲艺团苏州弹词演员。
- ② 高美玲（1934— ），女，时为浙江省曲艺团弹词演员。
- ③ 苏似荫（1924—1986） 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- ④ 徐丽仙（1928—1984） 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- ⑤ 张维桢（1933—1989） 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一九六〇年

一月六日 在上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吴宗锡、李庆福，请他们帮助办两件事：（一）把上海、苏州、常熟全部评弹艺人开列一张名单，注明各人所说的书目，并且说明是单档还是与谁搭档。（二）去年国庆节，在上海见过上海评弹协会出版有一种铅印的广告单，每月一张，把全上海各书场当月说书艺人和所说书目统统列在上面。这种印刷品据说是出卖的，请代找一下，可否把过去几年的广告单找一份给我，想从这里看看上海书场近几年说唱的书目。信中注明：“以上两件事不限时间 办后送我。”

一月七日至十九日 徐丽仙、张维桢在杭州演出。朱介生^② 同到杭州排书。演出十三天，陈云到大华书场听书九次。

一月二十日 上午，和徐丽仙、张维桢、朱介生等谈话，向他们了解《双珠凤》整理工作的进展情况。在此以前，陈云已经听过金漱芳、金采芳^③ 姐妹说的未经整理的《双珠凤》录音。听了徐丽仙他们的书后，又了解了他们的整改设想，两相比较，认为整理工作是做得好的，希望他们的改动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。他赞成改成六个中篇的设想，这样既可分，又可合。

① 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7页。

② 朱介生（1903—1985）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③ 金漱芳、金采芳，女，都是弹词演员。

一月二十日 写了《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》。在此以前，陈云请施振眉把他发表过的对整理传统书目的意见，归纳成一份书面材料。施振眉于上年十二月下旬整理成文后交给陈云。而后，陈云自己动手写成书面意见，写后又征求过施振眉的意见。

陈云在《意见》中，对传统书目的整理提出几个方面的要求：在内容上，“要去其有害部分，保留精华和无害部分”，但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错误；在方法上，“应该边改边说”，“逐步改好”；在情节和语言方面，经过改编，适当精练，去其繁琐，应该有穿插和噱头，但不宜过多。经过整理，达到如下目的：“思想上，精华突出，主题明确；结构上，能长能短，前后连贯；艺术上，既要严肃，又要活泼。”^①在《意见》中，陈云特别提出了“防止反历史主义”的问题。这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，是对“左”的思想说的。

一月二十一日 写信给吴宗锡。随信附去《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》。信中谈到，在杭州和徐丽仙等三位同志谈话的目的，是问问他们所唱的三十六小时的《双珠凤》中，哪些是已经把传统说法改过的新说法。他们初学，只有四个多月，成绩还好。每部传统书，如能都有这样一步粗糙的、但是有益的整理，就可说是一种成功。几个月就要求整理得很完美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也只有靠艺人自己来整理。

二月二日至三日 二日上午和三日下午，在苏州召集座谈

会，参加者有凡一、郑山尊、曹汉昌、周良^①、颜仁翰等。谈话的内容，主要是新书目的创作和传统书目的整理。陈云在谈话中指出，要努力搞好新书目的创作，新书到群众中去演出，是会受欢迎的。新书开始时不要怕短，经过不断加工，会好起来的。“要扶持新书，对创作新书的人，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。现在唱的俞调^②和俞秀山唱的不会一样了。马如飞的马调^③，分了好几派。这是后人的加工。对新的总要多花点力量扶持。”

对于传统书目的整理，陈云指出，可以先录音，再翻成文字本，然后分为不用、大体可用、用小部分几类分别进行处理。学传统书，可以全部学下来，但演出要经过整理。整理要通盘考虑，只搞片断，不完整，先要有整部书的轮廓。“传统书如果只剩下一截一截的，我们这一代艺人就没有尽到责任。”^④他还指出，评弹具有教育意义，要考虑影响。传统书中不少地方有常识性错误，整理时要注意改正。要区分神话和

凡一（1922—1999），当时任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。郑山尊（1909—1984），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。曹汉昌（1911—2000），当时为苏州人民评弹团团长，后曾任苏州评弹学校校长。周良（1926—），当时为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，后曾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，苏州市文联主席，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，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，《中国曲艺志》副主编。

^② 俞调，是弹词唱腔流派之一，曲调委婉，长于抒情。创始人为清嘉庆、道光年间弹词艺人俞秀山。

^③ 马调，是弹词唱腔流派之一，曲调流畅、明快。创始人为清同治、光绪年间弹词艺人马如飞。

^④ 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 11～12 页。

同上书，第 13 页。

迷信。噱头不可没有，又不可滥放，应该是既严肃又活泼。“要提倡严肃认真的台风”，“眼睛不要乱动，不要油腔滑调。唱腔允许各有风格，但要保持评弹特点。”

二月二十三日 写信给吴宗锡，商量为评弹现场录音安排的演出。原安排的计划中，有几档响档连续安排在杭州演出，陈云在信中希望近期内上海团不要安排在杭州演出。主要考虑到，响档接连来杭，说日、夜两场，要准备书目，可能有困难，而且还会影响其他书场的上座率，影响其他艺人的声誉。

信中还谈及《玉蜻蜓》，说他看了越剧《玉蜻蜓》后，认为评弹不能像越剧那样处理。演戏与说书有很大区别，两者是不同的。

三月一日 下午，在杭州和薛筱卿^②谈话，了解《珍珠塔》的演出情况。当时陈云对照脚本听了《珍珠塔》的录音。在谈话中，陈云建议，故事要说得有头有尾，说完整。《珍珠塔》书中宣扬封建道德的地方很多，但不要去掉书里的功名思想。当时的读书人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，读书做官也不是容易的事。三百个进士才出一个状元。考的人很多，许多人考不中。《儒林外史》反对功名，《珍珠塔》中也有看破功名的人。他还说，《珍珠塔》已经说唱一百多年了，定型了，改要慢慢地来。马如飞的脚本要好好保存起来。

三月二十日晚，在杭州和杨斌奎、杨振雄、杨振言、沈

① 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13页。

薛筱卿（1901—1980），苏州人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伟辰、孙淑英^①等座谈，了解《描金凤》的整理情况。杨斌奎他们在杭州演出十七天，据他们回忆，陈云到书场听书八九次。在谈话中，陈云说，他从小听过评弹，近半年中，因病休养，所以有机会听了很多书。传统书已经听过《三笑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双珠凤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描金凤》等七部，二类书听了二十部左右，还听过一些新的中、短篇。谈话中讲到“斩尾巴”时，陈云说，现在要重视传统书，而且要重视整理工作。他笑着说，将来历史上要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某年，吴宗锡当评弹团团长，割断历史，有罪。在讲到区别传统书的精华和糟粕时，说要注意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，应作些分析。无害的部分暂时保留，不必急于删去。他赞成精练，不要过于繁琐。他说，不必要的枝节和繁琐的说表，应大刀阔斧地删去。最近听了《白蛇传》，繁琐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例如许仙到苏州投亲、别姐、行路等，听后感觉都是多余的，拖拉得很。你们团里把它改为分回，听来就精练和舒服得多了。如果把日常生活中的睡觉、吃饭都放在书里，叫听众来听这些，那未免太繁琐了。在谈到现在演出的新书和整理过的传统书，都有文字本子保存时，陈云很高兴，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很好。在谈到“噱头”时，陈云说，“严肃应与活泼相结合。书中应该有适当的穿插，因为听书终究不同于上课，要让人家笑笑。工作疲劳了，要有轻松愉快。过分严肃，像上课一样，那

杨斌奎（1897—1972），苏州人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杨振雄（1920—1998）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杨振言（1921— ）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沈伟辰（1940— 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孙淑英（1937— ），女，时为上海市评弹团演员。

也不必叫书场，可改为训练班了。”^①过去有滥放噱头的现象，纠正过来是好的，但不能过头。在问及沈伟辰、孙淑英学《西厢记》时，他们说刚学，不熟练，所以有“口冲”。陈云说，工作中会有成功，有失败，这是免不了的。像打仗一样，一个军事将领，打两次胜仗，一次败仗，这就是能干的将领了。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地学习，一方面要在实践中锻炼，不要胆小。能攻能守，能进能退。只会攻不会守，未必高明。

据沈伟辰、孙淑英回忆，陈云在谈话中问及《西厢记·寺惊》中的法本。他们说：法本和尚和包围寺庙的孙飞虎有一段对话，老师是起角色的。我们年轻，又是女演员，起足角色有困难，所以改成说表。陈云说，你们改掉这一段很好，两个女演员在台上起强盗角色，有损自己的形象。老师的书如有不适合你们的地方，应该有所改动，不一定要完全照老师的说。他再三对我们讲，《西厢记》是部好书，要我们好好向老师学习。

据蒋月泉回忆，这段时间内，他也去大华书场演出过。

四月十六日 写信给吴宗锡、颜仁翰。信中指出，听杨斌奎老艺人说《描金凤》时，我对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这一点有些怀疑，怀疑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。这次回北京，请中国历史研究所考查了一下。据他们考证的结果，在隋朝就通过船了，明朝仍是通的。这是一次有益的考证。特把中国历史研究所的来件（附后）打印几份送给你们，除你们留两份外，请再给杨斌奎、朱介生、薛筱卿三位老艺人各一份。信中还说，开封能否坐船到襄阳（《珍珠塔》），南阳能否坐船到洛阳（《双珠凤》），我仍怀疑，还在请历史研究所考证。

^① 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（增订本），第 23 页。

附：

关于明代从苏州到开封、洛阳的水上交通状况

经苏州到开封、洛阳的水上交通线，往前追溯，是在隋朝大业年间（605—616）就基本上通行。当时是引了洛阳西面的洛水流入黄河，顺流而东，又从汜水附近引了黄河的水流入汴河，经过开封城南，到山东境内和泗水会合，再往东南流进今江苏境内，而与淮水会合，这就是当时所说的‘通济渠’。同时还从淮安附近引淮水流入长江，这是当时所说的“邗沟”。接着又开通了南运河，从现在的镇江附近引了长江的水，往南直到杭州（中途经过苏州）这样通过洛水、黄河、汴河、淮河、邗沟、长江、南运河所形成的一个交通网，而把苏州、开封、洛阳之间的水上交通线确立了。

从唐到宋，汴河虽有时淤浅，但因为随湮随浚仍旧起交通运输的作用。到元朝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），黄河于开封附近决口，夺去了汴河的水量。以后贾鲁治河的时候，并没疏浚中牟以东的汴河河身，而是修浚了京水（即贾鲁河），使它往南经过开封城西，再往东南方流去，到今安徽省颍上县的南方流入淮河。查考明朝人所作的《天下水陆路程》一书（现在只看到了一种抄本），里面列有《清江浦由南河至汴城水路程》一目（第六十九），详细记载了从清江浦（即淮阴）顺着南河（即淮河）前往汴城（即开封）的经过地名和里数，基本上和贾鲁治河以后的情况相符合。按清江浦位在今江苏省境内运河与淮河相交的地方，而清江浦又和苏州同在运河沿岸，洛阳与开封之间本来又有水道（黄河）相通，这就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候苏州、开封、洛阳之间是有水路可通的。

有的史书上说明朝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想着修浚“开封漕河”而未实现。但《明史》的《食货志》里却说：“洪武元年北伐，命浙江、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（开封）。”明朝人王圻所作的《续文